

论新中国史的主体性与通史研究和教材编纂

宋月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具体、历史地系统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不断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深刻彰显新中国史的主体性,包括这一历史的方向与道路、根基与灵魂、必然与动力、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前途与命运等基本内涵、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通史的关键在于“通”,包括总史之通和子史之通。新中国史特别是其通史研究和教材编纂,就是要在历史长河、时代大潮中充分体现这一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纵深性和广深性,在新中国史理论的基础上将传统意义上的通史“单线性”与时代意义上的通史“广深性”结合起来,创新发展新中国通史研究、教材编纂的内涵、方法与手段。其中,新中国史理论不单单是史学理论,更为根本的是思想理论、实践理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相对于历史理论则只是一种学科方法论。

关键词:新中国;历史主体性;新中国通史;新中国史理论

作者简介:宋月红,男,法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6)04-0041-07 **收稿日期:**2025-12-20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6.04.003

历史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所处历史方位的社会力量创造及其相互作用的历史,其主体性一般表现在这一历史是何者的历史,以及属于什么性质、以什么为本的历史。新中国史则是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领导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其主体性包括这一历史的方向与道路、根基与灵魂、必然与动力、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前途与命运等基本内涵、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新中国史特别是通史研究和教材编纂,就需要立足其历史主体性,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进行立体、全面和贯通性体系化研究,以深刻蕴含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一、新中国史中的社会矛盾运动与历史方位

社会矛盾运动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基本矛盾关系的社会生产、生活运动。只有将这一社会矛盾关系彼此结合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及其社会形态,由此在社会合力的主导和推动下不断处理和解决相应社会历史时期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调整变革和发展进步。社会矛盾运动始终是在社会发展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把握其社会历史底蕴和内在机理,在适应时代大潮中解决旧的矛盾关系并建立和形成新的矛盾关系而向前推进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重大项目“新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史研究”(项目编号:22STA002)

的。社会生产力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历史地看,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通过“破坏一个旧世界”并“建设一个新世界”^①,变革和调整社会矛盾关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只有变革和调整不相适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矛盾关系,建立起彼此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矛盾关系,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剥削。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③,因而,“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④。当时的历史现状决定了只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然而,要推动和完成这一社会矛盾运动,不仅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更需要掌握和主导这一社会矛盾运动方向的领导力量。历史和实践都为中国人民诞生了这一领导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成立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开启了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推动社会矛盾运动中,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实施“一化三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之后,党根据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尽管经历过失误和挫折,但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经过实施多个五年计划,在改革开放前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史新中国史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领导人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

社会矛盾运动总是不断发展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党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同时坚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领导人民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质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党领导人民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党总是根据社会矛盾运动规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历史地系统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党治国理政规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新中国史中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新中国史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产物,其发展进步方向与潮流、目标与任务,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基础、时代背景、现实条件、发展动力、实践进程、因果关系、历史经验、历史地位、时代价值,无不深刻贯穿、蕴含和彰显这一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是新中国史的客观实在性的集中表现、主体性的深刻彰显,据此在思想认识上生成关于新中国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从整体上,新中国史的发生发展是复杂、深广的,性质、内涵是丰富、深邃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一体发展、融会贯通于历史、现实和未来之中。从历史的主体性上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集中表现在新中国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之中。

(一)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中国史是党领导人民开创并不断发展的历史,党的初心使命充分表明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是党性的根基与源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新中国的坚实根基、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贯穿于新中国社会矛盾运动之中。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在了自己的光辉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结合”中提出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强

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指导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立国之本,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国家的核心利益集中体现在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在治国理政中,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新中国在发展中国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新中国史既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又是在反对和抵制一切危害和侵蚀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形成和发展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 32 年的主要成就时指出,“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①。新时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四)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领导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②。在对新中国成立 32 年的历史作基本估计时,决议强调,这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③;同时,在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必然性时,强调“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④。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则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贯通党的百年历史,指出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之,党在百年奋斗中,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① 《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 84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152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83 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91 页。

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党领导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构建新中国通史研究和教材编纂的理论与方法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历史的社会有机体和总体面貌,是各种社会因素和现象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主线相联系和彼此作用,并在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中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合力体。人们研究编纂历史,诸如中国史,创制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形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等体裁体例。新中国史研究编纂,不仅要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同时更要根据新中国史的主体性、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历史逻辑与规律性认识,以及正在发展的时代性内涵与特征,将这一历史立足中华文明,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长河、内在机理与时代大潮中,置于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融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和新境界、中华文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划、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世界贡献。新中国通史研究和教材编纂,相对于阶段或时期史、专门史、专题史,应是能够更全面、有效地反映和揭示新中国历史发展逻辑与规律的主要学科基础、方式与方法。

通史的关键在于“通”,包括总史之通和子史之通。前者,既有纵向连续的贯通,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又有横向交织的融通,如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者,既有专门史、专题史的“单线通”,如新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生态文明史和外交史、思想史、制度史等的通史,又有比较法的“异同通”,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②。通史不单单是与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相对应的纵通史,而更是全部史、整体史,即使是专门史专题史,也并不排斥“通史”法则,也需要有自身的“通史性”。历史的深厚底蕴、历史的广阔内涵、历史的本质、历史的深远意义赋予新中国通史的纵深、广深,需要在其研究编纂上将传统意义上的通史“单线性”与时代意义上的通史“广深性”结合起来,创新发展新中国通史研究编纂的内涵、方法与手段。

历史研究及其教材编写的对象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社会有机体,相比于“历史中国”的新中国史,其鲜明特色是其为正在发展着的历史,直接联系和衔接着现实和未来,在其深厚历史底蕴、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大潮,推动改革中发展,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推进加强新中国史特别是通史的研究及其教材编写,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运用新中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真实、立体、全面地科学认识和深刻揭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历史必然性、实践规律性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不可逆转、势不可挡,构建形成关于党治国理政史、中国式现代化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史的主体性、基础性、整体性内涵,推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成果和历史宣传教育传播文本。这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科学认识论基础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17页。

②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81页。

和基本依据,是具有知识性、大众化和引领力、感召力、传播力的科普性研究成果与学习教育读本。

欲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先有正确的历史观。新中国史特别是通史的研究及其教材编写,在思想理论指导和历史观上,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充分彰显“两个结合”的真理力量和重大意义;在国家内政外交史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从党情国情世情出发,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胸怀家国情怀,开阔世界眼光、拓展国际视野,把新中国史具体、历史地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力量。

在文明意义上,新中国史是中华文明在新中国的传承发展史、实践创新史,既是历史的,更是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编纂新中国史特别是其通史,就要充分彰显这一历史在其历史长河中的历史全面性、整体性、纵深性和广深性。这里,在思想认识和学科意义上存在一种误区,这就是将新中国史理论片面地、局限性地理解为史学理论,而且把这一史学理论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史学方法与手段上,既从内涵上忽视其自身思想性和理论性,又从学术体系上排斥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

历史理论是关于历史本体、历史社会、历史逻辑、历史规律的认识体系。从整体上说,新中国史就是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国情和社会面貌的“百科全书”,从认识论上讲,新中国史理论则既包括史学理论,又不仅限于此,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关于这一历史的思想理论、实践理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相对于历史理论则只是一种学科方法论。研究编纂新中国史特别是通史,史学是一种最基本的学科基础,但从整体和全貌认识和研究这一历史,若仅有此或局限于此,则是不适应新中国史研究编纂需要的。旗帜决定方向,科学思想指引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导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理想变成现实。新中国史作为党的治国理政史,灵魂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①。

新中国史理论具有彼此相互联系的理论体系,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新中国史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历史进程、成就和经验,特别是历史发展大势、历史规律和历史观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二)新中国史理论是党领导人民指导实践的理论,包括党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理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理论、改革开放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理论等。(三)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本体、历史社会、历史逻辑、历史经验和历史大势的规律性认识。党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精神等,就是其集中体现。(四)新中国史理论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和史学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把新中国、新中国史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用以丰富发展新中国、新中国史的认识和方法,推动新中国史研究编纂及其理论与方法广泛而深入发展。

新中国史理论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集中概括和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是新中国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是思想政治理论,在新中国史理论中处于指导地位。党领导人民指导实践的理论,以历史理论为基本依据,以史为鉴、指导实践、开创未来发展,既上升为政治理论,又是历史理论的实践基础。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本体、历史社会、历史逻辑、历史经验和历史大势的规律性认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13页。

识,是党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的产物,贯通新中国史理论体系和学科关系。新中国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理论的重要学科基础与来源,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融合发展,形成关于新中国、新中国史研究编纂的学科集群。

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史理论内涵和逻辑关系,以此作为新中国史研究编纂的思想理论认识基础,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随着新中国史的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推动构建关于新中国史研究编纂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将不断健全完善发展新中国通史研究编纂理论与方法。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eneral History Research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SONG Yueho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hered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 correct conception of Party history, analyzi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aws governing its development in a systematic and historically grounded manner. In doing so, it h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governance by a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 law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general law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initiative, it has profoundly manifested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is subjectivity encompasses such fundamental dimensions as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s foundation and soul, necessity and driving forces, themes and main lines, dominant trend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its future prospects and destiny. Together, these constitute the basic connotations, core principles,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PRC'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a general history lies in its capacity for integra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encompassing both the coherence of overarch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specialized historical studies.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RC, particularly the compilation of general-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therefore fully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ness, integrity, depth, and breadth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within the broader currents of history and the tides of the times. Build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RC history, such efforts should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linear approach to general history with a broader and deeper conception suited to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hereby innovating and advancing the content, methodology, and approaches of general-history research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Moreover, the theory of the PRC histor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merely as a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More fundamentally, it constitutes a theory of thought, practice, and history itself, while 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serves primarily as a 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theory.

Keyword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RC; theory of the PRC history

[责任编辑 孙晓鹏]